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信息参考

2017年 第4期（总第4期）

西南政法大学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编

2017年4月17日

目 录

高教视点

给高校放权松绑动了真格.....	1
“两个一流”建设要防止潜在老问题.....	5
高校需要先进的行政文化.....	10
智库国家队 塑造软实力.....	13

理论研究

破解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难题的战略思考.....	19
通识教育还需创造性转化.....	29
构建中国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几个重要问题.....	35

高校动态

清华今年将按16大类招生 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	54
-----------------------------	----

国际视野

美国高校人才“跳来跳去”，制衡靠“软调节”.....	56
十问耶鲁大学校长.....	60

给高校放权松绑动了真格

教育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6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瞄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入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

记者就此采访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深入解读“权”“放”了哪些,如何“放”。

放权高校硕士博士培养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是当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进一步深化学位授权审核改革成为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必要选择。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透露,此次改革的主要举措,一是突出质量标准主导作用,进一步细化学位授权审核各类申请基本条件,加强申请条件与研究生培养的衔接,严格按照申请基本条件依法依规实施授权审核。对一些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高校,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可不再要求培养年限。二是明确由省级学位委员会规划本区域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的发展和建设,审批本地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授权专业,组织实施本地区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和博士学位授权初审。三是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放权部分具备条件的高校自主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评审,探索设置新兴交叉

学科学位点。四是强化学位授权审核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资源配置、培养质量和学位授权点评估的有效衔接，加强授权审核工作的过程管理。

本专科专业支持高校自主设

《意见》提出，改进高校本专科专业设置。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支持高校依法自主设置专业，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和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以外，高校自主设置专业，实行备案制，专业设置备案每年集中进行一次。除医学、教育、公安和司法四类国家控制的高职专业外，原则上不再新增国控专业，高校可根据专业培养实际自行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方向。

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

对于高校编制改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所属高校现行编制规模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后，我国高校编制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求。”这位负责人表示，按照《意见》规定，将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

该负责人介绍，关于高校人事管理和岗位设置，教育部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岗位总量、结构比例、最高岗位级别确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收入分配方面，除根据政策要求保留绩效工资总量核定权、主要负责人绩效工资核定权外，其他权限均已下放至所属高校。同时支持高校推进内部薪酬分配改革，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可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办法。

这位负责人透露：“教育部正在研制所属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有关文件，进一步健全制度、强化监管、规范管理。下一步，教育部将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继续推动落实和扩大高校人事管理自主权。切实做好根据高校发展需要实施调整编制、岗位总量，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向高层次人才集中单位倾斜等工作。”

教师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至高校

对于备受关注的职称评审，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透露，“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主要包括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审批权和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意见》实施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条件不具备、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教育、人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在评审方法方面，强调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该负责人说。

扩大高校经费安排、使用自主权

《意见》对“完善和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管理”提出了四方面要求：一是解决高校经费安排自主权、统筹使用权问题。通过完善预算拨款制度，优化拨款结构，加大基本支出保障力度；针对基本支出占比较低的地方，要求进一步优化结构，合理安排基本支出，以扩大高

校经费安排自主权。通过尽快完善资金管理办法、采取额度管理等措施，由高校在批准的预算额度内、在不改变项目资金用途的前提下，自主统筹使用项目资金，扩大高校项目经费使用统筹权。

二是解决高校经费支付效率偏低问题。针对高校经费管理特色，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划分，逐步扩大财政授权支付范围，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简化用款计划编报内容，逐步实现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项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报用款计划，减轻高校工作量。

三是解决高校资产处置及处置收益使用权问题。一方面，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适当提高资产处置的备案和报批标准；另一方面，学校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应淘汰报废的资产，处置收益由上缴国库调整为留归学校使用，以调动高校的积极性。

四是解决高校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问题，由税务部门执行好各项涉及高校的税收优惠政策。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4月7日06版）

“两个一流”建设要防止潜在老问题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 席酉民

1月24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标志着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入操作实施阶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依赖工程或项目推动，形成了固定思维，一时间，高校各类争创“两个一流”的策划和活动“蜂拥而起”。本文以冷静和建设的态度，提出在“两个一流”建设中需紧紧锁定大学之本，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良性生态的形成。

“两个一流”建设序幕已经拉开，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自不必多言。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止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影响包括五个方面。

防止为一流而轻视本科教育

第一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在追逐“两个一流”的显性指标中，有意无意地轻视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这是因为大学存在之本的教育很难量化和度量，所以很多“两个一流”指标都与科研挂钩。

例如，世界一流学科排名的基本评判指标是：一流的科研生产力（看论文发表数量）、一流的科研影响力（看论文被引用次数和高被引论文数）、一流的科研创新力（看专利数和热门论文数）、一流的科研发展力（看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等等。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含

1%) 则为世界顶尖学科；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 1%至 5% (含 5%) 之间则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学科；若某学科进入全球排名 5%至 10%(含 10%) 之间则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学科。这些指标很少涉及教育。

在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美国，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重建本科教育”近年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中国，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强调教育在“两个一流”建设中的地位，例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就曾发表文章指出：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纵观国外一流大学，不论是学科专业特色突出的学院，还是综合实力突出的大学；不论是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还是国际有影响的公立大学；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无不将本科生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甚至连大学校友会和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也放在本科毕业生这个群体上。这种现象的存在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因此，在“两个一流”建设中，这一对本科教育的潜在影响不可轻视。

防止浮躁之风加剧

第二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会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的浮躁之风，使原本比较落后或不受重视的教育的处境更加恶化；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在强有力的多方支持下穷于应付，难以精心地专注于研究和创新，发表文章很多，科研成果也不少，但突破性的不多；使本应宁静的大学校园日益失去其应有的氛围。

过去 20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各种工程的驱动下很多数量和指标急剧发展，但整个高教届渐渐失去了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和践行。加之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干扰，教育包括政府资源配置方式和大学

发展战略常被误导。现在高教同行在工作和会议中张口闭口各种指标和不计其数的类似“千人”“长江”等人才数字，少有思考什么样的学生能够立足于未来和这个时代大学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好老师。各种教学评估、竞赛和工程层出不穷，但却漠视现在的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大学如何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学习。虽然说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我们听到或看到甚至直接体验到的是这些年来高教发展中存在的很多奇怪现象，例如对高教改革失去方向的批评，对大学做跟班式科研的无奈，对海归人才质量的质疑，以及“两个一流”主导下各高校对学科大拆大建甚或重新包装等折腾的抱怨。如何利用“两个一流”建设战略规避这样的弊端应引起各方的关注。

防止违背教育与科学规律

第三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可能违背教育与科学规律、瓦解大学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强调在推进“两个一流”中突出一流学科建设，这当然有利于让优秀学者找到归属感。但许多学校为了进入“两个一流”的篮子，不是潜心按照科学规律稳步建设，而是过分拼凑和包装，甚或砸重金从别的高校“买”一个学科来，以超常的方式从国外“吸引”人才；另外，过分依赖老院士、名教授、“海归”的名声和成就或高产能力，而不是重视学科的系统构造和加强后备队伍建设。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虽然某个学科可能会突飞猛进，但整个学术生态的提升可能孕育更多优秀人才和学科，也可能使重大发现和大师不断涌现。

人才学和人类历史不断证明，杰出人才和重大科学发现大都是冒出来，在可自由追随自己兴趣、能长期静心钻研的生态环境中，伟大人物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便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目下习惯的以工程配置

资源的机制、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体系、重选拔轻土壤的各类人才工程虽然也可能浇灌出几颗苗甚或大树来，但却失去了大树成林的机会。而这极不利于大学和学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防止错失引领世界的机会

第四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会使中国教育错失千载难逢的赶上和引领世界教育的机遇。这其实也是“两个一流”建设的主要目标，但为何会有潜在的“背道而驰”呢？

现在，稍加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从部属大学到地方本科院校，大家都在热情拥抱“两个一流”，其中的积极价值当然无须怀疑，但我们仍要细究这种热情是否使我们本来在教育理念和操作上已经落后的“以知识和内容为导向”、重应试的“被动式”教育雪上加霜。

面对全球化、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时代背景，大量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促使全球范围之内不得不反思教育、重塑教学、再定义大学。我们向往的许多欧美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尝试以一些颠覆性的改革去回应这个时代的需求，斯坦福大学发布 2025 计划，改大学的四年制为终生制以支持学生的终身学习；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等则开始探索深度的跨学科教育来培养通专结合的人才；以开创美国通识教育闻名的哈佛大学也在重新反思其通识课程的合理性并作出重要改革；更不要说像高教届新锐密涅瓦（Minerva）大学可能给整个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

反观国内很多大学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绝大部分还在以过去欧美高校实行的“研讨式”“小班化”等为目标，调整不合时宜的体制重新梳理人才培养的链条，让很多改革停留在枝节和过去，少有针对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做出变革的例子。在这个关键时刻，“两个一流”建设需要引导的是对教育变革的关注，对教育探

索的投入，对教育发展趋势的把握，对教育理念的更新以及对教与学模式的重塑，而不只是在一些指标上把一部分大学和学科搞成“世界一流”，更不是把教育领导者、院士、大教授和老师的能量和眼光拴在为了一流的一些“数据和排名”上，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错失与全球一流大学站在同一起跑线探索未来教育、赶上世界发达教育理念并有可能引领未来教育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防止误导一般院校的特色发展道路

第五个潜在的负面影响是有可能误导一些一般院校的办学目标和特色发展道路。

本次“两个一流”方案让大家津津乐道的“世界一流学科”给了很多整体上不强但学科特色突出的地方高校以机会，但现在高校判断学科水平的指标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上也是一个对学科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并不关注学生。因此，可以预见，这一惯性评价体系会把更多的高校纳入统一的学科和学术建设轨道上，让那些过去无法企及“985”和“211”的地方院校把注意力放在少有的几个有希望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ESI指标上，进而忽视其特色办学和教育育人的主要任务。

上述这些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如何利用“两个一流”建设解决这些“顽固不化”的老问题，应该成为国家教育战略关注的新问题，而不是等到“两个一流”建设完成后，再以另一个工程来面对这些老问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2月9日14版)

高校需要先进的行政文化

北京工业大学宣传部长 邱晓飞

高校是社会组织的一种，为了达到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遗产的多重发展任务，是离不开行政管理的。高校去行政化绝不是不要行政，相反，高校需要理念先进、科学高效的高水平行政管理。

笔者认为,解决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为学术服务”的行政思维。大学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是知识生产、知识保存、知识传承的特殊社会组织，学术是高校存在的本质意义，没有学术就没有高校。由于行政权力有明确的层级组织形式和强力的权力运行模式，并且拥有各类资源分配权，在与学术权力的对比中占有明显的强势地位，因此，大学要不断强化“为学术服务”的行政思维。大学的行政人员既是行政权力的服从者与执行者，更是全员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行政人员要和专任教师一样，对学术抱有应有的敬畏，对学生饱含深情。只有这样，行政权力的影响力才无法超越学术权力，学术权力才有可能真正得以独立自主的运行。当然，高校也存在教授对行政管理人员不尊重和不理解的现象，认为做教授比做管理高级，其实，高校行政管理的知识性和专业性都在不断提升，很多行政管理人员在本领域中都是专家能手，教授能够做好学问，不一定能够做好管理，双方彼此尊重和信任，才是大学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状态。

行政文化最直接体现在一所高校如何进行制度构建。笔者认为，

拥有务实、以人为本的制度体系是拥有先进大学行政文化的重要表征。这里的“务实”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对同一所大学而言，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随之变化，大学的制度设计也要随之动态调整，而非一成不变。现实中，很多高校一直沿用的制度已经制约了自身发展却浑然不知。上海交通大学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工程科学人才的培养目标，2008、2009年前后其工科学院逐步改变了3年期限的目标管理考核方式，而采用了6年期限的国际评估考核。其国际评估选择两类专家，一是国际上最好的工科学院院长，二是国家骨干企业的总工程师或研发总经理。这是为了解现阶段上交大的工科学院与世界一流工科学院的差距有多大，与工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差距在哪里。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在学校工科发展转型时提出的，体现了上交大务实敢为的行政文化理念。第二，对不同高校而言，不考虑自身定位和发展特色，盲目引入所谓流行或者通行的管理制度，也是不够务实的表现。越是内涵式发展越要关注学校的个性和特色，统一标准是规模化生产的方式，不适合高校。教育部近期开展的审核式评估就是很好的制度设计，它已经不再使用一套同样的标准来评价大学，而是关注一所大学是否遵循了其自身设定的培养过程，实现了这所大学自己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代表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巨大进步，给予了高校更多的个性化发展空间。

构建“以人为本”的制度体系是大学的组织属性决定的。大学是高度密集的创新人才构成的组织，其组织属性是不断向社会输出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成果，因此大学制度激励的最高境界是激发师生创新精

神，提升创新能力。制度激励是一种内生动力机制，通过规则、制度的设计，实现对组织成员的方向引导、动机激发和行为强化，以人为本的制度能够持续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致力于激发全校师生的学术理想，为其追求学术理想提供平台和保障，只有这样，高校师生才会对各项制度有认同感和融合度。构建以人为本的制度体系，是高校行政文化的精髓和骨架，也应该是大学综合改革的根本动力和要求。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核心在于多样性，尊重师生的个性化需求，越是行政理念先进的高校，工作生活在其中的师生越是拥有更多选择。无论是学生选课、转换专业，还是教师考核评估，人才聘任方式，都应该是多样化的。随着以人为本的行政文化理念不断融入制度设计，未来大学行政机构将趋于扁平化、弹性化，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校行政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如果每所高校是一架疾驰向前、追寻理想之光的马车，大学行政就是车轴和车轮，不重视行政工作的高校是很难跑得快、跑得远的。建立“为学术服务”的行政思维，构建务实、以人为本的制度体系，营造开放而包容的文化生态是未来高校行政的发展方向。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7日05版）

智库国家队 塑造软实力

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举行，中央企业智库联盟成立，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联手打造高端智库平台……一段时期以来，智库成为热词，日渐走进经济社会生活。我国各类智库亦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现阶段，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已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共同发展的全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那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着怎样的意义？应该如何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请看专家对话。

中国智库 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同时，在“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

记者：近年来，我国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不但在国家发展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作用，更日渐走近寻常百姓，让越来越多的人分享其研究成果。那么，智库是什么、在我国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辉耀：事实上，智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溯至齐国的稷下学宫和战国四公子的门客集团，都是中国著名的早期智囊团。汉高

祖刘邦有“三杰”、唐太宗李世民有“二十八功臣”，以及后来的幕僚制度，都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智库”。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智库应运而生，官方主导的智库首先出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刘元春：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于西方，最早是个军事用语，指二战期间防务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们讨论作战计划和制定战略的保密室。我们现在所谈的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大学和社会智库等类型。

记者：就我国现状来说，智库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出现了哪些问题？

刘元春：根据美国某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6》，2016年全球拥有智库 6846 家，其中中国 435 家，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可以说，中国智库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进入了黄金时代。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下的“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管用的智库产品更少——有些智库机构疏于研究问题，却专注于对外包装、智库排名；一些专家也是打着智库的旗号，忙于争抢课题和项目，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大数据时代，现代智库的最大特点是由过去个体化的行为变成了组织化的行为，由基于个人智慧判断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更多依据科学数据的行为。然而，我们的很多智库跟传统的“智囊”没什么区别，还是以个体发表观点和写文章为

特点。我认为，推进智库现代化建设是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很多国家，各国的政局稳定性、经济发展程度等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分成很多个有针对性的项目和主题，把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新型智库 核心支柱

专业性、独立性、公益性是智库的重要特质；智库建设应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决策。

记者：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那么，您认为，这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具体体现？

迟福林：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认为应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方面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求智库建设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与行动研究，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决策，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有过激烈争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交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采用；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揽子”政策建议；2015年，中改院又发出了建设中欧自贸区的呼声……另一方面，智库发展更应强调“创新”，尤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保持客观独立性，强化专业性，塑造理性、专业和

有担当的新型智库特色。

记者：的确，专业性、独立性、影响力等，都是评价智库的重要因素。智库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发展，而智库的价值取向更是关乎决策、关乎“灵魂”的大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体需要以怎样的价值取向为支撑、目前又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朱旭峰：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关节点在于专业性和独立性。专业性是智库区别于其他政策参与者最重要的品格，意味着专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有长期积累。与此同时，独立性也是每个智库都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所谓智库独立性的丧失，其实质是智库被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绑架了，公信力自然不复存在。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现在不少智库从业者更关心的还是找到符合政府部门意图的课题。有些时候，基于数据分析的智库所做出来的研究结果可能和政府机构的预期和初衷存在差异，按理说智库应该把科学的结果提供出来，但事实上，有些报告却可能会作一定程度的修改。

刘元春：的确，现在一些智库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甚至会囿于小团体或自身利益，发表一些偏激甚至错误的观点，既缺乏国家层面的宏观视野，服务性与公益性也不足……这无论是对智库的长远发展还是对国家的稳定和谐，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规范引导 优胜劣汰

以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为导向营造智库思想市场环境，促进高水平智库脱颖而出。

记者：在我国智库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借助这些智库

吸纳更为广泛的研究成果以提供决策参考，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为避免一些智库偏激、错误观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又需要对其进行一定规制。在“培育”与“规制”之间如何平衡？

刘元春：“培育”与“规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推进智库思想创新的两翼。从培育的维度看，应进一步放开思想市场，推进中国智库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应进一步加强高校智库建设，促进大学智库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发动机”；对于社会智库的发展，应在市场准入和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从规制看，一个公开、透明、竞争的智库思想市场本身就可以提供强大的约束力，制约、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同时，为了避免市场失灵，为了增进效率、促进公平、保持稳定，政府也可以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

迟福林：智库的本质属性是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需要以强化智库的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为重点，加快完善智库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强对各类智库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近年来，一些领域和地方出现了“智库热”。这一方面表明社会对智库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性看待我国智库发展的现实差距，不可拔苗助长，应促进高水平的智库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

袁岳：智库是一个专门的行当。事实上，偏激的观点本不应出于智库。智库应基于准确的数据，需要一整套的方法论，结果应该是运算出来、科学可靠的。但现在一些智库，只是原来的机构翻了块牌子，出现一些问题又因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整治起来有一定难度。我认为，除了通过外力规范以外，还应着力从内部提升各类智库的专业性，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降低偏激、错误结论出现的可能性。

记者：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应从哪些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朱旭峰：这不仅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营造。其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首先，政府逐渐建立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思想交流平台。其次，政府委托智库进行专项研究是最直接有效的采纳专家意见的方式，这需要完善智库评审和智库竞争机制。第三，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智库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尽量减少一些智库迫于生计而受利益驱动的可能性。

王辉耀：在社会和专家学者的个人层面，同样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九成左右的中国智库是官方智库，在影响决策中起关键作用，而社会智库却面临生存困境。智库之间竞争不足，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动力就会有所欠缺。建议更多鼓励商业协会、公益组织等为社会智库机构捐资，营造公益捐赠的社会风气；同时加强对各类智库的管理和规范，形成更为良性的“竞争机制”。对专家学者而言，应注重涵养家国情怀，努力保证自身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独立性，真正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贡献一份力量。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4月12日06版）

破解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难题的战略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甘 晖

人才工作关系国家发展，关乎民族未来，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工作进一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对人才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吹响了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的号角。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一次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理念进行深化，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全面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据不完全统计，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2015年末常住人口数占全国的27.01%，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数占全国的24.86%，本专科学生数占全国的24.61%，专任教师总数占全国的24.42%。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中，西部高校肩负着为西部培养各类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历史使命，其功能价值和战略地位不言自明。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是西部高校发展的生命线，直接决定西部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但是，在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第四轮学科评估等重大工作以来，全国高校人才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态势，西部高校正在面临新的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亟待找到走出现实困境的对策和办法。

西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人才竞争白热化。从世界范围看，真正能引领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水平提升的高层次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国际竞争激烈，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不强。从全国范围看，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急需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有“称号”的人才更是稀缺资源，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以来，“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人才竞争之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与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校相比，特别是与这些地区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相比，西部高校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稳才任务显像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教师的薪酬水平和科研条件差别悬殊。近年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才支持力度和薪酬待遇，“主动联系”、吸引西部高校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特别是有“称号”的人才到东部工作，新一轮“孔雀东南飞”现象正在形成，西部高校教师队伍人心思动，时有高层次拔尖人才要求调离，“稳才”任务已经显像化。

人才成本畸升化。地方政府和高校都充分认识到高层次人才作为稀缺资源的重要价值，为了在人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调整引才政策、提供优惠待遇，各类人才的年薪标准节节攀升，例如，东部地区有些高校为“青千”年薪“开价”70万元，为“大千”“长江”“杰青”开价甚至高达200万元，已经完全偏离了理性的路径，甚至有违社会主义分配政策和社会公平原则，导致优秀人才“行情日涨”，高层次人才成本“一路飙升”，西部高校限于财力只能望“才”兴叹。

引才风险扩大化。为了引进人才，高校不仅要提供较高的年薪、尽可能优裕的生活待遇，更要提供科研平台建设费和相应的物理空间，

组建学科梯队。通过“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人才计划申报引进的人才，学校给予的支持力度更大，动辄就是上千万元投入。一个聘期结束后，如果这些人才被“挖”走，平台建设投入经费就打了“水漂”。对于西部高校，这种高层次人才引进难、稳不住的不确定性存在较高的经济风险，而且呈现扩大化的趋势。

西部高校人才工作难的主要表现

人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引才难。高层次人才来源，无非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对于西部高校，实际只有国际市场，且与东部地区在同时竞争这个市场。由于办学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学条件、学科水平、校友分布、当前师资来源等多方面的差异，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高校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有效信息掌握有限，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导致西部高校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更加困难。

违约追责难导致的履约质量低。合同聘用是目前高校人才聘用的基本形式。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易于发生两种违约现象：一是人才到岗工作时间不足，二是人才没有严格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就后者而言，由于教学科研成果产出有其自身的周期和规律，人才在首聘期内产出标志性成果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学校很难追究其违约责任，也因此导致人才履约质量低的问题，难以取得预期的引才效益。

国际差异导致的续聘待遇难降。为了吸引海外人才，高校对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首聘期的个人薪酬待遇、科研费投入和团队支持条件通常都倾其所能、就高不就低。首聘期结束后，这些人才对条件、待遇的心理预期居高不下，如果不按原来的高标准续聘，就很难留住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客观上，这些海外人才家属在国外的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如果按照原来的薪酬标准续聘，则会造成学校

用人成本越来越大。如何找到合理的、能让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们“归队”的办法，是许多西部高校面临的问题之一。

双轨待遇导致“儿子”“女婿”摆不平。西部高校教师工资水平明显低于东部高校，且大部分高校都实行校内原有教师“工资+岗位津贴”分级聘任、引进人才年薪制合同聘任的“双轨”薪酬体系，校内自主培养的优秀人才取得较大的学术成就后，岗位津贴标准仍然难以有序提高（且岗位津贴不能延续到退休收入中），与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相比，待遇落差较大，很容易造成自主培养的优秀人才流失，出现所谓的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的怪象。

西部高校人才工作难的成因分析

待遇不设上限是导致人才流动的直接原因。迄今为止，国家并没有对高校教师岗位待遇设置上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相同岗位级别的教师待遇差别较大，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年薪标准更是差别悬殊。例如，“杰青”的年薪，东部高校有的达到100万元甚至200万元，而西部高校一般仅为40-60万元；“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的年薪标准4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这些都导致了人才的异常流动。据调查，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均设有大学教师的最高收入标准，且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别相对较小，客观上降低了大学教师因收入大幅提高而产生流动的主观动机，也减少了大学以经济诱因进行人才不正当竞争的机会，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无论与国际大学比，还是与国内其他知识密集行业比，我国教师群体的平均薪酬待遇相对较低，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待遇更低，客观上驱使教师产生“向钱看”、奔着高待遇而去，致使引才难、稳才更难。

同质化办学是人才竞争白热化的内在原因。当前，我国大学“同

质化”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大学特色不鲜明，办学目标定位模糊，学校组织结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办学理念甚至校风校训等“千校一面”。相当多的学科专业在很多大学“遍地开花”，客观上加剧了相同学科的优秀人才紧缺和恶性竞争。有的教学型大学不满足于教学型，揠苗助长盲目向研究型大学拔高，也不遗余力“掺和”对研究型人才的抢夺，哄抬了人才市场行情，对大学之间人才的异常流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把尺子量不同学科和学校是外部原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校长的评价，还是大学对人事处长、学院院长的评价，包括国家和社会对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评价，在人才队伍方面实质上还是看带“称号”的人才数量（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四青人才”为关注重点），导致高校竞相争夺本就十分稀缺的带“称号”的人才，在人才计划申报上不惜血本、做足了功夫，“一家有女百家求”，进一步助长了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和校际流动，人才引进成本不断攀升。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科，其发展阶段和建设水平存在差异是正常现象，国家和社会要允许高校根据自身校情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实际需要去引进和培养适用的人才，不能单一地通过带“称号”的人才数量来评价其办学水平。

人才计划各自为政是导致人才盲动的诱因。目前，各高校给予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的薪酬水平、科研支持经费、家属安置等待遇和条件都比普通教授高出很多，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力。但是，国家“千人计划”仅面向海外引才，各级地方政府设立的人才计划仅面向省外引才，各高校设立的人才计划仅面向校外引才，国内外、省内外、校内

外教师不能平等竞争这些人才计划（“万人计划”虽然面向国内人才，但竞争非常激烈，且基本集中在少数特别优秀的国内人才）。人才计划的这些申报条件限制，客观上导致国内人才设法出国“镀金”、曲线自赎，省内人才积极到外省申请人才计划，校内人才竞相到外校申报人才计划，成为高层次人才跨地区、跨省区和校际异动的重要诱因。

破解西部高校人才工作难题的思考与探索

大幅提高教师的保障性收入比例。目前，高校教师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岗位津贴、其他津补贴三大部分，其中工资收入比例最低，岗位津贴比例最高，但岗位津贴依据“在岗原则”发放，无法纳入退休待遇。收入分配的保障、激励和调节功能出现了失衡，保障部分比例过低，激励部分比例偏高，调节部分作用微弱，教师被导向“为了生活而挣钱”，而不是“为了学术理想而创新”，导致原创性成果产量低、产率低，劳民伤财，也造成高级知识分子疲于奔命，其平均寿命低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英年早逝、“过劳死”现象时有发生，应该引起国家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梦，还是大学要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都亟待下大决心提高教师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特别是要大幅度提高教师保障性收入及其占比，减轻高校教师经济压力，使教师“著书不为稻粱谋”、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使全社会回归对教师的尊重，进而吸引更多真正高水平的人才到高校工作。在即将进行的绩效工资改革中，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建议适当对西部高校予以倾斜，同时对青年教师群体给予调节性收入补贴，让他们免于为生计奔忙，静下心来履行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责，产出更多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

引导各级政府和大学国（境）外引才。目前，我国人才计划多，引进人才愿望非常迫切。从人才总量看，除非开拓国外人才市场，否则国内人才总量并未增加，人才计划实施的结果，势必造成“人才”（部分追名逐利的“人才”不应称为“人才”）的国内频繁盲流、用人成本的无益攀高，而非国内人才总量的快速增加和人才创造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建议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和高校改变人才计划工作思路，提高中国在国际人才市场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才工作政策、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打消国（境）外人才回国或来华工作的后顾之忧，大力从国（境）外引才，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观贯穿于高校人才工作的始终。

设立西部重大研究专项人才计划。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西部发展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西部地区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亟待深入研究。长期以来，西部高校围绕本地区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问题，形成了一大批特色和优势学科，有条件有能力开展这些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建议国家应在评审条件不降低的前提下，在“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优青”等人才计划中统一设立“西部重大研究专项人才计划”，设立单独的评审指标，设定一定的年限（建议5年为宜），吸引海外人才、东部地区人才和西部地区人才共同竞争申报。

设立西部地区专项人才调节津贴。吸引和稳定人才在西部工作意义重大而长远。目前很多人才留在西部或来西部工作，并不是因为没有“本事”去东部地区找到工作岗位，很重要的动机之一是照顾年迈的父母（很多人才的父母仍然生活在僻远落后的西部农村），无论是从国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弘扬孝道的意义上，这些人都

应给予褒奖。另外，应该注意到，西部高校的教师，其生活成本并不比东部低（他们教育子女、赡养双方父母等的开支实际比东部地区更大）。建议对于虽未入选人才计划，但长期在西部地区工作的教师和从东部调入西部工作的教师，应给予“西部地区专项人才津贴”。津贴标准与其在西部工作的年限相关，工作时间越长，津贴标准越高，同时将该津贴纳入退休待遇。

建立西部人才支持条件倍增政策。为了能真正吸引海外人才到西部工作，鼓励东部人才到西部高校工作，建议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愿意到西部地区工作的人才计划入选者（指学术评价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评选出的人选），给予比东部地区高一倍的政府奖金或科研经费。例如，给予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100万元生活补贴、200-600万元科研经费，给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万元政府奖金、青年学者60万元政府奖金，依次鼓励享受奖励的入选者至少在西部地区工作两个聘期。

尽快建立起人才流动补偿机制。为了有效规约人才市场的不正当竞争，降低西部高校引才风险，建议以国家政策形式做出“刚性”规定，对于通过正常渠道流动的人才，本着“谁引进、谁补偿”的原则，由引入单位、受益地方政府和中介机构等共同支付人才流动补偿费用，补偿范围包括人才培养成本和人才引进成本。前者包括人才本身的价值，人才学历教育、岗位培训、访问进修等费用，后者包括引进时的安家费、购房补贴、科研启动费、实验室建设费、薪酬等。

出台高层次人才年薪指导意见。针对目前国内出现的不同地区、不同高校高层次人才年薪标准悬殊的实际情况，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针对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年薪标准的指导意见，明确厘定不同地区

各类人才的年薪标准及上下浮动范围，引导用人单位在科研投入、平台建设和团队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吸引和支持人才工作。

出台有效措施限制从西部引才。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人才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都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其背后最大的动因是发达地区的高收入、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当前，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上、广等地，吸引人才的最主要因素是高收入、子女高考录取分数相对低、晋升机会多等。既然都是公立高校，建议国家在提高西部高校教师待遇（包括其子弟上大学与东部高校子弟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缩小与东部高校差距的基础上，出台有效措施限制东部高校到西部地区“挖墙脚”引才，例如在各类人才计划申报材料审查时，严格对申报人工作单位的审查，凡是从西部到东部工作未满五年的，不能申报国家人才计划；西部高校引进的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非学校原因在西部工作不满两个聘期不得调离，否则取消称号并追回奖励，等等。

破解人才工作难题的实践探索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六所部属师范大学之一，作为老牌的师范院校，由于其历史原因，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国际人才市场上还显得较为单薄。因此，学校领导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破解人才工作难题。一是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模式，拓宽引才渠道。打破常规，定期组团到海外高校或科研机构招聘；搭建“曲江学者论坛”等校内引才平台，增进了解，建立情感认同，提高引才的精准度；继续采用网媒、纸媒、新媒体等宣传媒介，出品新版招聘宣传片、宣传材料，立体化宣传学校，提高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人才引进效益，为各类人才计划（工程）储备力量。二是实施“四动”引才工作新机制。学校2014年提出“学校推动、学院主动、

典型带动、部门联动”的引才工作新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学校主推、学院是引才主体、各部门相互配合的工作理念。三是设立“文科资深教授”“理工科领军人才计划”，设立“优秀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资助计划”“教学终身成就奖和教学团队”“教学名师计划”等，选拔在教学上业绩突出的教师作为表率，引领青年教师潜心教学、教书育人，在教学上作出突出业绩。类似这种人才计划项目，校内还有不少。通过一系列人才计划的实施，截至2016年12月底，全校共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200余人。四是采用全程精细化申报人才计划方法。近年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人才计划申报工作，学校均安排高层办牵头，集聚各部门的力量，专门地采取精细化、全过程跟踪的工作方式，在严把候选人遴选关的基础上，要求学院首先帮助申报人论证申报材料，保证对本人学术贡献的总结准确、到位，对未来拟开展的科研选题具有前瞻性。截至2016年12月底，近三年学校共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40余人。

经过一系列的实践性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已经形成了具有师大特色的引才理念和引才方式方法，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人才“白炙化”战争，学校上下齐心、积极面对，迎难而上、勇于挑战，争取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过得好”。

（文章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5期）

通识教育还需创造性转化

秦春华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在我国渐成气候。无论赞成与否，它都成为本科教育改革无法回避更无法忽视的一个存在。然而，一拥而上的改革似乎带来的只是浮躁，形式上对英美通识教育的模仿在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人们开始怀疑：通识教育是有用的吗？通识教育究竟是提升还是降低了本科教育质量？通识教育是中国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吗？对于这些问题，简单回答“是”或“否”都是不严肃的。我们必须追本溯源，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通识教育，厘清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才能明确如何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通识教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委员会发表了划时代的经典文献《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在呈送给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的报告函中，委员会明确提出：“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它是要将自由的和人文的传统灌输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之中。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和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的人。”我认为，这段话是理解西方或美国通识教育的“总纲”。也就是说，通识教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美国社会实际的教育。

理解通识教育的真义，我们必须回到美国通识教育产生时的社会背景和实际情况去理解。通识教育绝不是一群教育学家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美好概念，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都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哈佛那些伟大的学者已经预见到了美国和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分化、分裂、动荡和冲突等种种危机，二战期间具有相同专

业知识的科学家在不同价值观下往往会做出截然相反的行动，就是这种危机的佐证。为了克服这些危机，他们选择了通识教育之路。通识教育的核心目标，是让学生树立起对美国社会的信念，认同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推动美国的发展和进步。一句话，通识教育是美国社会的教育，带有鲜明的美国烙印，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教育。

因此，英美社会普遍推行通识教育，绝不仅仅只是因为通识教育本身具有价值，也不仅因为它是英美教育传统中的精髓，更是为了解决英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教育领域所做出的扎扎实实的努力。这种努力虽然极为艰难，也充满了曲折，但却不能不承认其效果显著：它的确帮助美国成功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期，并起到了支撑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从通识教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为美国利益服务固然是通识教育的终极目标，但它的确有效提升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并在事实上提高了受教育者的能力。看清楚通识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不意味着通识教育思想不能为我所用，恰恰相反，如果通识教育能够有效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实现创造性转化，也一定可以改善和提高中国的教育质量。特别是，虽然通识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根植于西方文化，但其具体措施却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通识教育在英美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目标包括凝聚社会共识、辨别判断价值观、表达与交流、终身学习、丰富人生、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等多个方面，从当前实际出发，我主要谈前两个方面。

首先，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凝聚社会共识。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人们往往关注通识教育的实现模式和具体措施，却忘记了通识教育的目标。社会需要共识，今天处在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凝聚自己的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共识不能只依靠动员、宣传、口号和标语，也不能只依靠开会和文件，最根本的手段是教育。通过教育，学生逐步懂得世界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社会是什么，自己是谁；通过教育，学生逐步领悟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前进方向；通过教育，学生逐步学会和他人的沟通、交流、妥协与合作，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正确理解他人观点；等等。因此，就可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凝聚起社会对中华文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这一功能只能通过通识教育实现，任何其他机构和专业教育都无法替代。

其次，通识教育具有辨别并判断价值观的功能。凝聚社会共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现起来非常艰难。不是说有了一个目标，人们就会自动去实现这个目标。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人们对于目标的认识和认同，而这种认识和认同又源于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内心的想法和判断。在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的选择是什么？学生对此必须能够鉴别并做出判断。要想能够鉴别并做出判断，首先必须了解这些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它们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专业教育要么无法提供，要么很难提供，只能依靠通识教育。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鉴别价值观并做出判断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但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有些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一目了然，比如，不能杀人、偷盗和强奸等，但有些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就不一定那么泾渭分明。实际上，价值观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之中，正

确与否也总是反映这个社会中的人群的主流认知与理解。目前，一些中国大学仿照英美大学的核心课程体系，也开设了诸如“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之类的课程。然而，讲述并让学生了解什么是西方文明并非是我们的目的——虽然它也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比较，帮助学生更深刻地思考、理解、体悟中华文明的价值，明白中国道路选择的意义，从而树立起中国文化的自信。这才是通识教育帮助学生辨别各种价值观并形成判断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非此就不可能收到教育的效果。

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通识教育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要实行通识教育，不是因为通识教育是个好东西，而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角度，重新设计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重建中国的通识教育，我们需要从古代中国的教育智慧中汲取力量。如果说通识教育的理念源于古希腊的话，它的另一盏明灯就点亮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其实早就蕴含着通识教育的思想，并且远比西方超越。这个思想不仅是指“通识”，而且是指“通德”。这个“德”就是价值观，也即道德。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论证中国古代也有通识教育，以此来说明其实我们并不比西方差，也不是要倡导恢复诵读儒家经典的传统做法。我的意思是说，重建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我们至少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不同文化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思想源泉。正如西方通识教育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只有也正是这个传统而不是西方传统才更契合今天的中国社会。第二，不同国

家和民族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立场。正如西方通识教育的立场是西方人和西方一样，中国通识教育的立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立场。第三，不同社会的通识教育要解决各自所面临的不同社会问题。正如西方通识教育要解决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相对立，而是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有所区别，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通识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凝聚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以往这项工作是由思想政治课和党团活动来完成的。这是必要的，但仅此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缺陷：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之间的割裂。教育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把思想政治单列出来，表面上看是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其结果很可能是降低了实际的教育效果。二是教学模式陈旧，方法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学习思考的兴趣。实际上，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学生所接触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同小异，内容、形式和方法枯燥重复，缺乏新奇的刺激，难免产生倦怠。三是没有用教育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告诉了学生很多现成的结论，教师精心编写了教材，但却很少要求学生去阅读经典原著，也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讨论交流机会。现在有多少学生通读过《资本论》？有多少学生通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有多少学生在课堂上围绕着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过讨论？不读书，不思考，不讨论，这哪里是教育？

通识教育要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本科阶段，学生应当对当代世界的几种主要文明和价值观有所了解 and 认知。但这种了解不应当是浅尝辄止，而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了解各种文明的精髓。

比如，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文明的主要观点；等等。课程不能纠缠于具体的知识，因为每一种文明都博大精深，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像专业教育那样去学习，必须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最基本和最精髓的内容。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对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比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

上述两点是建设中国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但做到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成了通识教育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课的“旧酒”装入通识教育的“新瓶”之中，那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通识教育，我们还必须做到：帮助学生切实提高交流的能力，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使学生的人生变得更有趣味，更为丰富，帮助学生克服专业教育带来的狭隘。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识教育仅仅是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见到一定的成效，至今仍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也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我们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东西方的教育传统中汲取精华，踏踏实实地探索自己的通识教育模式，明确目标，改进教学理念和方法，同时具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才能提供给学生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实现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价值。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4月11日13版）

构建中国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几个重要问题

韩源 县祥

【摘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交汇于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学术三条线索的发展。三条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三大矛盾,即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以“一指三中”为总目标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于抓好三个核心任务: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活力、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立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文简称“一指三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本文试图从全球化的分析视角,揭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解读“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并对贯彻“一指三中”的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条基本线索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简单划分为国别史或民族史与世界史或全球史两个阶段。国别史和民族史阶段,各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模式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然而自从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全球化推动人类历史沿着具有共同文明逻辑特征的发展方向演进,人类文明开始向世界史和全球史阶段转换。这是一个由资本文明开启并主导的全球性大冲撞和大交汇的文明整合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共同的历史逻辑。可以认为,由此开启的现代文明所经历和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应当置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中来解答,世界的问题如此,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

1. 中国卷入全球化的三重逻辑

全球化原初的动力源泉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攫取最大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趋势，构建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掌控下的生产体系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题的全球历史阶段。

资本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从此，一切国别的和民族的自身文明逻辑都被卷入一个共同的全球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也因此而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中华文明相对稳定和独立地传承了三千年的历史逻辑被打破，中华文明的单一线性发展由此中断，从而开始了一个从民族性历史向全球性历史的转换过程。这一以“资本扩张”为主题的转换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主线不可能再坚持传统的文明逻辑。

然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全球历史并不是终结于资本主义。在由资本作为原初逻辑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可是资本主义在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的同时，也播撒着新的野蛮，资本主义的限度随着它创造的辉煌一起生长。马克思在颂扬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限度，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资本主义制度能释放多少文明就会积累多少矛盾，最终，资本将会埋葬自己。因此，资本扩张作为全球化的原

初逻辑注定会生长出自己的否定性因素，然而资本不会自发地和自然而然地消灭自己，这种消灭是一种超越与再生。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奥秘的同时当然不会忽略对超越资本方案的推演和构想，甚至是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的发现与构想的指引下蓬勃兴起，这是资本主义文明与资本扩张的必然组成部分。由此，全球化的内在逻辑逐渐发展为双重驱动的两条线索，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和遏制与超越资本主义限度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两条线索和两条道路是中国卷入全球化必须作出的选择。

应该强调，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的世界，复制的并不是与原发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的繁荣和文明，而是其剥削机制和内在矛盾的全球扩展。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会成为原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对象和矛盾全球转移的载体，因此，中国在全球历史转换中的主线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这已经被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实。在全球化的两条线索中，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将会随着其否定性因素的增长而衰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超越资本主义的限度而标示着全球历史的核心逻辑。以“十月革命”为象征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中国在全球历史转换中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指明了方向。

分析至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全球史转换要经历两次否定和超越才能得以实现，首先是资本作为全球化的原初逻辑对中国原有民族性和国别性文明逻辑的否定和超越，进而是标示着全球化最终方向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民族性文明逻辑和资本原初逻辑的双重否定和超越。这种双重的否定和超越同时也是双重的继承与整合，因此，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走向，既割不断传统又不可能坚守传统，既避不开资本主义文明又不可能重走西方道路，而只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导向能解决

这双重的矛盾，实现双重的超越。推演至此，中华文明面对世界大变局实现全球性历史转换的三重逻辑便清晰呈现出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充分吸收资本文明并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换。

2.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条基本线索

中国历史的这种转变是全局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都在经历这场转变，作为文化领域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生产与发展也承袭了历史整体的这种质变。与历史整体的三重逻辑相对应，全球化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单一发展的局面，使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产生的原初逻辑交汇于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学术三条线索的发展。

所谓“西学东渐”的实质是中国遭遇资本全球化的文化形态。随着对反映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说翻译的增多和传播规模的扩大，在创办新式学堂和改革旧式书院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分门研习及学务专门等分科原则，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介绍到中国，并在综合中西学术科目的基础上，逐渐建构了一套近代西方式的学术分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在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这条线索上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全球性转换经历的第一次否定和超越。

然而正如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核心逻辑必须经历对中国传统和资本文明的双重否定才能确立其社会主义的方向一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题也必然产生于对中国传统学术和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的双重超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这既为

双重超越提供了现实路径，也同时是这种超越的结果。从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三重逻辑的交汇与作用就构成了其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应对“变局”实现“转换”的三重历史逻辑中，中国发展的导向和制度框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是经创造性转换的中华文明，而在现实的发展历程中又必须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这三条基本线索反映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其本质、核心、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传统学术精华理应作为历史发展的底色而继承，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创造出的优秀学术成果同样值得借鉴。尽管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决定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部因素，但却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只有把握三条基本线索的作用机制，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找到准确的历史方位。

二、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的三大矛盾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变局衍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对矛盾：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它们是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原初逻辑衍生出来的，表现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同一发展过程的三种张力。这三对矛盾的解决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主题。

1. 科学与价值的矛盾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三条线索的牵动，产生了科学与价值的矛盾，解决这对矛盾要坚持以科学为基础、突出价值导向的原则。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虽然要充分关注其研究旨趣，考虑其价值诉求，但不能排斥共同的分析、概括、总结、归纳等科学方法，以及运用概念和范畴等来表述科学研究规律和结论的科学“通则”。

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也好，中国传统学术也罢，尽管存在局限、缺陷甚至错误，但其中都蕴涵着不同程度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成分，至少反映了人类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阶段性成果。应该认识到，任何学科的理论学说都存在不同的学派或体系，任何学说能成一家之言都是因为具有“科学”的特征（从某种角度用某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或揭示了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这是不因视角、方法等的不同而不同的），这些特征是所有学说体系都共有的，姑且称为可通约的“科学通则”。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国传统学术三者共有的科学性层面上得以建构，科学性的基础地位应当确立。

当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忽略比较成熟但仍在发展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为当今学术主流的现实背景而完成，这就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要充分吸收“西方体系”中的社会科学范式。这种“吸收”从所谓“体”“用”之争到近年刘国光先生文章引起的讨论一直试图解决吸收什么与如何吸收的问题。这关键是坚持和发展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借鉴和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可通约的“科学通则”，并加以改造与整合，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和前沿性的前提。

确立“科学性”为基础的原则，应避免淡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导向的种种倾向。当前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仅仅强调其作为“分析工具”的特征，然而，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说客观上无法逃避对价值问题的回答。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

和价值目标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构了超越其限度的社会主义方案，实现了科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科学与价值的力量，已为并正为一百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实践所反复证明。”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继承三条线索科学“基因”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

2.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三条线索推动形成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一个半世纪以来始终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个主流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一般把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大致归为现代。“变局”的原点逻辑决定了这对矛盾的解决不可能通过试图在中学的体系框架内融入西学而实现。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学”和与此相伴的马克思主义借其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力量消解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话语地位。守旧的传统已不能为新的话语所接受，而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既不能无视也不能离开“本土资源”，所以，对传统学术的再造和创新就是唯一之路。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系统中的修饰语由“传统和现代”转变成为“经创造性转换的传统和现代”。可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和学科内容上，这种“经创造性转换的传统”如何体现，和“现代”又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确立以现代为基础、吸收传统营养的原则。

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西方学说决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部理论来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中华文明积累的学术思想。然而值得注意，强调传统学术的价值要警惕“古教条”，应反对当前一些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渲染成“包医百病”的济世良方的错误倾向。传统学术的价值只有

纳入现代的话语体系，取得其现代形态才能表现出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形态，核心与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内容包含了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的借鉴。以现代为基础，吸收传统营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来解读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学术传统中的积极成果，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正如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应以其“现代”形态为基础框架，吸纳传统学术的积极成果，并结合时代精神，将传统学术纳入到建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阈中，运用传统所积累下来的思想智慧，思考和解答当下的新课题，实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思想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3. 民族与世界的矛盾

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换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表现在文化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就是如何解决世界“主流”与民族特性的矛盾。“西学”与“马学”是并存于当今世界的主流学术话语，但真正代表人类未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解决其与中国不断发展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关系在这里就表现为民族与世界的矛盾，这对矛盾始终伴随着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题不是民族思想逻辑的传承，而是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不是替换，正确处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应坚持以世界为基础、弘扬民族精神的原则。

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两个概念只有放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考察，两者才获得了区别于彼此的真正内涵。全球化使各种历史要素获得了全球性，时间与空间被超越了，世界性从此不再作为民族性的被动构成，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全新的、有实质内容的概念与民族性相对视。全

球化开启以来，世界性和全球性成为解读和实现民族性的出发点，我们不能仅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更要认识到具有世界性才有真正的民族性。正如别林斯基指出，“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因此，民族性的发扬光大并不是固守相互区别的个性，而是一个追求全球性、世界性和一般性的过程。值得注意，以世界性为基础不能陷入盲目照搬、全盘西化的泥潭，世界学术舞台上的“中国学派”只能产生于中国的民族史向世界史转换的实践土壤。

作为全球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以民族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共性的世界性课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性转换就是以具有世界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为框架的，针对民族性学术思想的吸纳与整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把握历史方位，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民族性的学术与文化精神只有在开放、融汇、更新、创造的世界性转换中才能得到弘扬。

三、“一指三中”总目标的确立及其科学含义

在全球化这一共同历史逻辑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作为资本主义批判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逻辑三种动因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可以认为，在经历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这三种因素是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总源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一切社会变革、一切社会矛盾、一切发展问题都从这里被牵引出来。因此，一切“中国问题”的解决都要聚焦于找到这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总规律，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科学的根本路径也必须从此开始。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轫于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历史逻辑，而它

的繁荣发展则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实现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探索中走出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这条道路的文化与学术维度。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赖以发展的源头活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遵循了中国作为被动卷入全球化国家所必然蕴含的三重历史逻辑：充分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社会主义道路超越资本的限度，寻求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在文化及人文学术领域，对应地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与借鉴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创造性转换。就像中国的社会发展既不能重走西方道路也不能回归传统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要避免相应的两条歧途。学术范式盲目西化的主张和传统复兴的幻想实际上都只看到中国卷入全球化三重逻辑的一个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只有生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土壤，正确把握三重历史逻辑和三条发展线索才能得到繁荣发展。“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不竭的理论创新源泉。”在当今世界学术舞台上，中国学术发出的声音不能滞后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立足和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战略制高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其社会实践基础而获得发展，其实际历程也是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变迁相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和发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而创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和新阶段。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对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努力形成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一指三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表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特征，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目标。“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归根到底是哲学社会科学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实践的特色、风格和气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根植于中国由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实践活动中，这一实践活动的当代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这场历史大尺度的转换蕴含的三重逻辑相对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条发展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对矛盾，因此，“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应置于三条线索形成的张力为背景，三大矛盾对立统一为框架的分析中进行解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与三重逻辑中社会变革领域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对应，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实践形式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理应包含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精神文化成果和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

“三中”的实质是强调个性的弘扬，而中国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只有在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才具有现实性，只有在对“科学与价值”、

“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对矛盾的解决中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就是沿着三条线索决定的发展方向，不断解决三大矛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四、贯彻“一指三中”的首要前提：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活力

“一指三中”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仅靠政权来推动，而要靠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永葆科学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创新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创新成果，但也应看到，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苏联模式”的影响并没有根本消除，这种执政模式下文化与学术活动往往依附于政治活动，难以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充分发展。执政党思想解放，意识形态就充满创新的活力，而执政党思想僵化，意识形态的创新就止步不前。政权的巩固是执政党首要关切的，因此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党政策相关的领域。这样，意识形态只体现其“政治规律”而没有体现其“文化规律”，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权的紧密相关性使得意识形态创新不稳定和不完整。因此，在充分肯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创新力的同时，不应忽视其创新模式中的缺陷。

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关键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转型。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即理论学说以政策主张的形式出现，

同时也成为完整的价值理想的表述形式，具体的政策以及具体的理论观点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而与价值理想重合。这种类型的结构缺乏兼容性与灵活性。实际上政策与理论观点都是动态的，而价值理想却具有“终极性”，在三者合一的结构中，这种矛盾会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经常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不同理论学说的论争可以是意识形态论争也可以是科学论争，关键在于其是否围绕意识形态的核心，即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展开。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结构三要素的合而为一，本属理论学说领域的正常科学论争往往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最终畸变为政治斗争。同样是因为理论学说与价值理想的重叠，由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具体结论构成的理论观点也被看做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核心而成为不可挑战的终极真理。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这种“合一”状态使得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单一化、僵硬化。这种“刚性”结构使得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政策主张及具体的理论观点一旦因历史条件变化而与实践相冲突时，这种冲突就容易扩展到意识形态的整个体系，因而政策与理论都难以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创新。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一开始之所以遭遇到巨大的思想阻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这种“刚性”结构。

目前正在实施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中，这种意识形态“刚性”结构的特征还比较明显，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几乎就是政策层次的文件汇编。而政策总是针对特定时期和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灵活性、动态性和多变性，这导致价值理想的“终极性”、理论学说的相对稳定性和政策主张的动态多变性之间产生紧张和冲突，坚定理想和解放思想形成难以解决的矛盾，老师和学生都时感无所适从。

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领域按自身特点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这种结构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而要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的这种结构转型，首先要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可以凝结为最高理念和终极价值的东西。这些最高价值理想与具体结论不同，具有终极性和稳定性，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要逐渐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通向“自由王国”等等价值理想，都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都应该看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其次是给予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因为它们都不具有“最高性”和“终极性”。第三是要把“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作为理论创新、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舆论导向的出发点、原则和归宿，既不要把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混同为“最高理念”和“价值理想”，也不能使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偏离“最高理念”的价值导向。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现代转型，才能使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具有自洽性、兼容性与灵活性，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在推力。

五、贯彻“一指三中”的关键环节：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按照“一指三中”的要求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核心和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科学的根本所在，这在当前的关键环节就是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理论学说往往具有价值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不同，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不同”，它们在价值引导和意识形态维护中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因此，要加强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有必要大致区分不同学科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强弱，根据其程度之别实行分层分类的建设。可以将不同学科分为意识形态性强、较强、中、弱或无等几个层次。大体而言，意识形态性最强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对应的理论和学科形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类理论学说和学科的建设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学科群的意识形态性较强，它们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的论证。这类学科应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中，从理论框架、研究范式、概念范畴、基本观点等方面确立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核心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学科领域取得基础性的支撑地位。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群的意识形态性为中等。这类学科主要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些学科中的有效运用，不过分强调具体观点的一律，不刻意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人类学、管理学、艺术学、语言学、体育学等学科群的意识形态性较弱，这些学科有的规律有人、物之别而无人际之别。对于这类意识形态性较弱的学科，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应主要着眼于这些学科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的功能定位，充分释放这些学科自由创新的活力。当然，这种划分是针对学科群的粗略划分，在学科群之下又存在差异，比如同属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逻辑学的意识形态性就大不一样，

同属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学的意识形态性也不相同，因此，更微观的理论建设可按相应的思路提出具体方案。

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主体性工作就是高校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建设。“两个体系”，尤其是教材体系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因此应高度重视那些覆盖面较广的课程的教材体系建设，在重点学科和重点教材的遴选给予适当倾斜。可以意识形态性的强弱程度及学生覆盖面的广度两项指标共同确定重点建设的优先秩序。目前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项目，首批启动并实施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九门基础课教材建设充分考虑了这类学科理论意识形态强的特点，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全覆盖更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性强和学生覆盖面广”的第一优先秩序。然而值得进一步分析，重点教材建设的第二、三、四批教材显然十分重视教材的导向性，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材占有突出地位，但从大学生的专业分布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数远低于管理、外语、艺术和经济等专业，而这4个专业的入选教材明显偏低。可以看出，重点教材的遴选对教材的覆盖面重视不够，因此有必要对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优先秩序按前述两项指标进行梳理。意识形态强、覆盖面广的学科和教材列为第一优先秩序，意识形态强、覆盖面较广和意识形态较强、覆盖面广的学科和教材可列为第二层次，以此类推，意识形态性弱、覆盖面小的学科和教材列为最后。

六、贯彻“一指三中”的重要措施：建立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除了强调理论与学术本身的积累与创新外，还应重视学科体系与学科结构的设置、调整和兴废。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一指三中”为总要求推动学科结构的健康发展。学科结构的发展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也要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的学科经验和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实现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大矛盾的统一。由此综合考虑，可以按照意识形态性、民族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and 人才培养需求、世界主流的学科规范四个导向建立起动态兴废的学科结构体系。

在意识形态导向方面，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一个重大和及时的决策，但是调整后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仍隶属于“法学门类”之下确显牵强，没有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地位，不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学科建设的指导。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从属于任何特定学科，那就应该设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并加以重点建设。还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有四大任务，一是推动作为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自身的发展，建立起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而非政治层面的交流平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在学术层次上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二是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不断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三是把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建设的依托；四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指导作用。因此，必须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仅仅只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狭隘认识，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的关系。学科的地位是学术地位而不简单对应于政治地位，其决定性因素是学科本身的学术发展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要避免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简单化倾向，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学科地位。

在民族特色导向方面，应集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综观当前使用的学科目录，其学科类别的设置实际上主要是源于

全球化以来西方学术国际化的结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遵循的三重逻辑要求其实现与中国传统学术的有效对接。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熔铸情况，中国优秀传统学术思想总体上并未深入到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内核。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本身要确立学科地位并获得繁荣发展。

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的导向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面向实践，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正确回答国内外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才能体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力量。”学科建设必须面向实践，实践在发展，学科建设也应当相应发展。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要求并推动了经济学迅速发展而成为“显学”。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地位开始凸显，要求与此相关领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学说所对应的学科加快发展。对这类学科领域，应通过新设学科或提升学科层次等途径拓展学科领域、丰富研究内容以加强学科建设。当然，社会实践需要是一方面，学科自身的科研实践状况又是另一方面。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志是：它必须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和学科体制。”学科体系的构建既要注意引领方向，又要实事求是，认真考虑当前学科发展与教育发展的现状。

在世界主流的学科规范导向方面，要积极主动融入通行的国际惯例与规范，这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原则。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全球化这一逻辑原点的产物，因而必将融入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格局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导向下，充分

借鉴世界性的学术范式和学科建设经验。在专业设置方面，一些学术强国是以课程的组合来形成学生的专业，而不是先确定专业口径，再来考虑课程。这种模式能很快地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做出反应，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三者的需要；在学科结构方面，以我国及俄罗斯为代表的指令性的“规范模式”，规范着高校人才培养的口径和领域，比较整齐，但缺乏灵活性；以美国为代表的“统计归纳模式”，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结果的一种统计归纳，具有逻辑性、连续性、适应性和发展性等特点，大部分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采用该模式；此外，设置综合、交叉门类或一级学科是各国学科结构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些反映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经验理应成为我们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熟悉通行的国际惯例与规范，才能逐步走向世界，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声音的重要前提。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学科结构的调整除了遵循以上四个导向外，还应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内容体系的成熟程度，以此区分不同的层次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总体上说，建立起以“一指三中”为导向，以稳定成熟学科、调整发展中学科、规划新兴和交叉学科为机制的动态学科结构体系，是当前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结构体系建设中的基本要求。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清华今年将按 16 大类招生 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

近日，清华大学大类招生工作正式启动，据悉，清华今年将打破院系和专业壁垒，推行“按大类进行人才培养管理”的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按 16 个大类招收、培养本科生。

据了解，16 个大类包括数理类、化学生物类、人文与社会类、机械航空与动力类等，除了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等少数几个学院独立成类外，其余大部分学院都面临着合并与重组，如化学、生命科学、医学、药学、化工等院系合并成了化学生物类。

此外，有的院系还根据专业不同划入了不同的大类，比如化工系，既出现在化学生物类，也出现在环境、化工与新材料类。

同时，每一个大类设首席教授，这些首席教授都是国内外鼎鼎有名的专家学者。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朱邦芬担任了数学大类的首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气污染防治专家贺克斌教授出任环境、化工与新材料类的首席教授，他们将直接参与本科生的培养。

清华大学为此成立了“大类培养领导小组”，由校长邱勇担任组长。邱勇表示，大类培养实施过程复杂，但衡量标准简单而明确，必须做到让学生的大一学习生活更加充实、高效、阳光，更有“获得感”。要大幅提高学生的通识教育素养，更好地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更有利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相互融合与促进。

据悉，清华将按照大类培养重构培养方案，专业上注重厚基础，学生学习上讲究自主性，学校人才培养上追求高质量。清华大学副校

长、教务长杨斌介绍，大类培养既有综合改革的推动因素，也有广泛的国际背景。这一改革举措在强化大类通识教育的同时，对专业教育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大类招生培养管理改革中必须正确理解“专业确认”，做好院系层面的制度设计，对新生的价值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来源：人民网 2017 年 4 月 7 日）

美国高校人才“跳来跳去”，制衡靠“软调节”

徐剑梅

美国以吸纳全球优秀人才出名，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才流动灵活。科研能力出众的教授不但可能被其他高校招揽，还可能被待遇更优厚的科研企业挖走。在美国，人才流动是常态。

美国高校挖人才、留人才，钱怎么花，为什么花，谁出钱，谁拍板，怎么保证花钱花出效果，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有一套完整的运作理念和制衡机制，重视软调节、专家集体决策，而不是单纯依靠硬管理。

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小凡告诉记者，在美国，不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引进诺贝尔奖得主或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不会从政府那里多得到资金支持。不仅如此，“荣誉帽子”是有保鲜期的，吃老本的人才不是香饽饽。与其说美国高校看重人才已经获得的荣誉，不如说更看重其研究方向与学校的契合度及出成果的潜力。杜克大学曾高薪聘请某美国科学院院士担任一个大型研究所所长，但每5年一次的评估，连续两次都不如人意。最终，杜克大学解除其所长职务，停拨学校为其提供的研究资金，这位院士灰头土脸地辞职走人。

虽如此，政府的软性调节也是存在的。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发放科研基金时，会略略偏向“弱州”。王小凡说，美国有20多个州在生物医学领域缺乏一流院校，属于“弱州”。如果单凭实力竞争联邦政府的相关科研基金，可能“强州”高校拿到95个项目，“弱州”高校只能争取到5个。但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科研基金时，很注重参与审批学者的地域代表性，甚至有些专项只允许来自“弱州”的高

校申请。这一来，“强州”大河有水，“弱州”小溪也无断流之虞，避免“雪球只往一个方向滚”。这在生物医学领域格外重要，因为健康研究需要全美范围的数据资料和研究对象。

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不会对人才流动进行行政干预。高校聘人，针对性、目的性很强，不求“贵”而求“对”。王小凡说，包括杜克大学，许多美国高校都有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本校重点研究方向，经过科学论证，最后确定“挖”什么人才。并且招聘人才时，一人一议，集体决策，过程透明，学校或院系领导不能拍脑门独自说了算，院系教授参与面试和最终决定。人才被挖时情形也一样，院系教授们会集体评估失去这一人才对学校的影响，学校怎么能提供更好的待遇加以挽留。

在王小凡看来，要保证健康的人才流动，在国家层面，考评标准不应当是一所高校拥有多少顶“杰青”“长江学者”等“荣誉帽子”，在导向上应避免高校为了考评数据漂亮而砸钱挖人才；政府也应设立某种形式的封顶，防止国家科研基金被随意转化成个人收入，阻止少数高校为挖人才而把个别教授工资提高到耸人听闻的地步。对高校来说，挖人才应当以出成果和发展学科而不是出政绩为目的。

休斯敦大学明湖分校会计学教授杜晖谈到，美国高校人才流动，手续非常简便，教师只需提前几周通知学校。但人才流动不会出现“一窝蜂”现象，不会助长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她说，在美国，不同高校有不同定位，服务于不同目的，并非所有高校都追求“大而全”，更不是所有院校都想“冲出本州，走向世界”。例如她所在的学校，就主

要为当地培养工程师、会计师、教师等人才，目标是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在美国东西沿海，名校星罗棋布，相形之下，中西部多数高校知名度略逊一筹。但杜晖教授说，就她所知，至少在会计学和工程领域，美国高校实力的地域差距并不明显。只有少数州因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缺乏名气响亮的高校，但也设法打造自己的特色。例如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一些高校以体育出名，得益于美国举国重视体育的氛围，也能吸引很多学生。

两位教授都谈到，和国内大学相比，在美国高校任教，会议少、杂事少，能够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和教学。王小凡说，他在学校，只需每两周参加一次教授午餐会，由一位教授主讲自己研究进展，大家相互交流看法。最近系里招聘新教授，他参与了面试，下周将再参加一次教授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最终聘用人选。此外，每学期系里会就研究生教育找教授们开一次会，此外就没什么会需要参加。行政方面，他基本不和学校管理部门打交道，每学年填写一次工作内容是否涉及利益冲突的表格，因做动物试验还需填写动物权益保护方面的表格，仅此而已。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夏斌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本地区高校的扶持力度。但在全国范围内，鼓励高校人才正常流动，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好事。他说，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人才流动性还比较低，不像美国高校，人才“跳来跳去”。人才正常流动，不仅能够体现人才价值、打破“近亲繁殖”，刺激学术活力，也能倒逼高校

“去行政化”改革。夏斌和王小凡都认为，国内高校要想挽留人才，尤其需要花大气力改变一些较为死板的观念和政策，变得更灵活和人性化，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美国不是所有州都追求建设哈佛耶鲁，中国也不是所有省份都非得拥有北大清华。夏斌说，这方面，美国的学院模式值得借鉴。他说，美国各州遍布中小型学院，它们科研能力不一定很强，但教育水平很高，能够培养出很好的学生。在考评机制上，以教育为主要定位的院校，考评也应以教育效果为主，而不是去比拼科研成果，这些院校的教师也没必要非得发表科研论文才能晋升职称。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王小凡所说，过去，中国侧重于引进国外人才，如今，在国内高层次人才流动方面，中国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但凡新情况，就会有新问题，但解决办法不是退回老路，阻止人才流动，而是从一个个细节入手，疏通、活泛人才管理机制的毛细血管，实现人才“有氧流动”的良性循环。

（文章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17 年 3 月 31 日）

十问耶鲁大学校长

蔡梦吟 张国

“世界一流大学”是当下国内一批名校的头等目标。最新提出的计划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不仅是传统名校在推进，新近筹备的私立大学如西湖大学，也以世界一流为榜样。

怎么看待大学，怎么看待中国同行？3月18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先生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

苏必德是耶鲁大学第23任校长，也是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上世纪90年代，他以与约翰·梅尔教授开创了“情绪智力”理论及“情商”研究而著称，他的著作已被译成11种语言出版。

我们节选其中的10个问答与读者分享。

问：采访之前，我们通过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收集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学排名。世界大学排行榜很多，不同榜单中耶鲁的座次不一。你在乎吗？会研究排名以使耶鲁获得更好位置吗？

答：当我们排名位列榜首或名列前茅，我们当然是骄傲的，但排名本身并非十分科学。一所大学的声望是影响排名的重要因素。而声望往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认为排名是了解顶尖高校的一个参考指南，但不要过分看重。

我不会去研究排名。如果让我对申请人建议，我会说排名不应是申请或不申请一所学校的原因。当然，排名接近的高校也各有不同，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并不代表任何区别。统计学家对此称之为

“虚假精确”，即排名并不能足够精确地区分出前三名之间的差异。前三名与第 49 名、50 名之间是不同的，但我不会太在乎那些影响排名先后的微小细节。

问：许多中国大学想要跻身世界名校之列，中国政府也实施了这样的计划。在您看来，这会是“长征”吗？中国大学的优缺点有哪些？

答：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让我印象深刻。事实上，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站在了国际舞台上。这正是我们寻求与中国高校推出学分互认项目、合作建立研究中心的原因。我们与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都有学分互认项目，因为它们都是好大学，而且只会越来越好。

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持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如果中国那些最优秀的学生都能被中国大学吸引，那么距离中国大学跻身世界名校就不会很久了。

我认为中美两国教育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在美国，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彼此质疑，也可以质疑老师，学生们会参与对各类议题的辩论；而传统的中国大学更注重对于学问的传授，而非互动，当然，这种情况现在也在改变。但我相信美国教育的最大优点之一就在于能让学生进行充满活力的辩论。我感觉这种风格会越来越多影响到中国大学。

问：您是怎样界定大学校长的权力和责任？您认为大学老师有哪些使命？

答：耶鲁大学有一个管理机构，名曰“校董会”，这个听起来老派的名字，可追溯至 300 年前。校董会有 17 名成员，都是毕业于耶鲁的各界领袖。我也是这 17 人之一。我所要阐明的是，当我们考虑一系列问题，诸如耶鲁的未来、我们的策略、我们所要强化什么、我们将要扩大什么等，我们必须以团队的身份去做。他们都很聪明，我只是成员之一，作为校长我会领导这个小组，但我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来。

在耶鲁，校长很大程度上是试图清晰表达学校发展图景的人。我也花了大量时间招聘领导团队，副校长、院长等等。同时，没有大量来自慷慨善良人们的赞助，耶鲁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这所大学。所以我也花大量时间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耶鲁，被耶鲁所鼓舞，对耶鲁产生兴趣。

在我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都是一名心理学教授，管理着一个研究情商的实验室，教授心理学概论等课程。在授课时我所要做的，或者说所有教授在授课时都想要做的，不仅仅是把我脑中的知识传递到你脑中，那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去激发学生想在余生中保持学习的兴趣。这样20年后，我的学生才会在聚会中对我说，“是你的课程激励了我，让我从事了什么什么”。读书，学无止境，让心理学与生活融为一体，这对我而言就是成功。

问：在线教育会是个趋势吗？再过半个世纪，未来的顶尖大学会是什么样子？

答：毫无疑问在线教育会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它在今天已经如此。我对在线教育最赞赏的，是它能对传统的课堂教育予以补充，如果我现在还在教授心理学课程的话，我肯定不会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我会让学生们在网上观看课件，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更多的探讨、辩论、试验和推理。

所以我相信在线教育会创造改变教育方法的机会，让我们得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教育到较以往千百倍的学生。我相信在线教育将会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我对此非常支持，但我不认为它会代替那种坐在课堂中，与师生共同学习的感受。

很难知道高等教育未来什么样子。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所提供的教育是为目前并不存在的工作机会和挑战而准备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教育，因此很重要的是塑造那些具有普遍技能的终身学习者。

问：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此话怎讲？

答：我想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教育的内涵。你具体在学习什么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并不如学习那些普遍的、能突破任何学科界限的知识与智慧，比如如何创新地运用思维，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清晰地沟通。

学习如何学习，或许更为重要，这样你就能够保持终身学习，即便毕业了也始终受到教育的滋养。

问：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写道，他认为美国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一观点？

答：我认为这本书“小题大做”了。我不会把我们富于创造力的、兴趣浓厚的、聪慧过人的、充满积极性的学生称为“我们的绵羊”。但是，我会把这本书看作是一种警告，即，我们始终要帮助学生不仅仅去记住知识，也要通过质疑、批判等方式与知识同行；不仅仅是让学生作为个体具备这种意识，在集体中也应同样如此，这将对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大有裨益。

问：10年前，耶鲁大学组织百名学生来华访问，特别是考察中国农村。让美国的青年一代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您觉得有多必要？如何让多数学生拥有跨文化体验？

答：我觉得认识中国对美国学生而言非常重要。10年前百名耶鲁学生访华，我是带队老师之一。从北京到西安到上海……我们在中国花了大量时间调研。我相信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气候变化、贫困、食品安全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携

手应对挑战。而美国学生越了解中国，这种合作才会越发成功。

我相信了解另一种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实地访问。耶鲁大学鼓励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进行至少一次国际交流。另一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语言。如今中文已经是耶鲁校园第二受欢迎的语言，当学生们理解中文并亲身到访中国，用中文与那里的人们交流，我相信那才是你欣赏一种文化的开始。

问：2016年，亚裔美国教育联盟提出了一项针对常春藤盟校的投诉，称20年来，亚裔学生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13%至16%之间。一些人认为这是缘于歧视。对此，你作何回应？在当下美国社会乃至世界许多角落都日益“被撕裂”的背景下，您认为大学可以为弥合裂痕作出怎样的努力？

答：这的确是一个争议性话题。当我们录取学生时我们是整体来看的。我们会看重学生的成绩，但同样注重领导力证明，注重你在多大程度上能为耶鲁的教育环境作出贡献。这造就了我们今天的课堂上，有许多亚洲人，许多亚裔美国人，许多非裔美国人，许多拉美人，许多本土美国人——来自全球的学生。这些由各种族裔构成的群体，是耶鲁学生的主体。

当今世界充满了冲突和偏见，我对此深表遗憾。但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迎接四海学子，他们背景各异，但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学习，成为同道中人，差异也得以被更好地理解。

与提供形式上的融合相比，更重要的是让每个学生都被同等对待，受到同等的尊重，所有想法都能够充分交流。在我看来这才是对抗偏见与冲突的最好方式。

问：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渴望到美国的顶尖大学学习，很多人关心怎样进入耶鲁。您有什么建议？

答：首先，我强烈建议中国学生力争在高中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和 SAT 成绩。我们已经增加了本科生中的国际生名额。我们会向学生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为了使申请脱颖而出，你在重视学业成绩和 SAT 成绩之外，还需要得到教师的评价和推荐，这同样重要。你的申请文书需要体现你将如何充分利用耶鲁的教育资源。同时要清晰阐述你想到耶鲁求学的动机。

招生办公室每年会收到大约 32000 份申请。从明年起，我们将扩大规模，每年录取人数将达 1550 至 1600 左右。学生们如何为彼此创造教育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耶鲁会注重评估每位申请人能够对耶鲁教育环境所作出的贡献。

问：还有哪些建议，是您觉得对青年一代而言至关重要的？

答：我对青年一代的建议是，尽可能保持开放的姿态，去学习新事物，认识新的与自己不同的人，去探索与所熟悉的领域相距甚远的世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向“意料之外”打开自己。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 年 3 月 22 日 10 版）

发行与交流：校领导、校内相关职能部门

西南政法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网 址：<http://fzgh.swupl.edu.cn/>

电子邮箱：fzghc@swupl.edu.cn

传 真：(023) 67258292

办公地点：勤业楼 3015 室
